

## 回忆抗战时期云衢中学的革命活动

□欧素英

我们的母校——云衢中学，创始于1809年，至今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，校址在中山四区南朗大岭头村前，当时叫云衢书院，后于1905年废科举，办学堂，改为云衢高等小学。在四大两都热心人士的资助下置有固定校产170多亩，收租办学，培育学子，是一所历代人才辈出的名校。

1942年，我在安定村小学读完初小四年级，转入云衢小学读高小，两年后，和插班生李俊驹、方若愚、李文彬、陈润聪、程慕贞等，在云衢小学毕业。时逢日军侵华，抗战烽火燃遍祖国大地，南朗榄边一带学子，无法升上中学。后得热心人士支持，1944年把云衢小学改为云衢中学，校址迁往南朗亨美村程氏大宗祠，我和以上同学一起，及时地升上云衢中学。3年后，成为云衢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。在毕业的聚餐会上，我们含着依依不舍的泪水，唱起了《友谊万岁》这首歌，老师最后说了一句话：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！”全班20多位同学，从此升学的升学，出国的出国，各奔前程了。

弹指一挥间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可喜的是我们这一班同学，在国内工作的，都分别成为国家机关处局级干部或事业企业中的骨干分子。有的在美国开餐馆，或当上了工程师。在香港创业有成的李俊驹、方若愚和著名会计师太平绅士李文彬同学，3位都先后光荣地被选为中山市的名誉市民。我们爱国、爱乡、爱校的精神，是从小受老师教育培养起来的，是与当时的抗战环境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。云衢中学当时的革命活动，曾使日伪汉奸震惊和愤怒，日本驻军头目吼叫：“云衢中学是赤化中学，上至校长，下至杂差，通通杀头”。

### 一、日军暴行，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

我在安定小学读书时，中山县已成立抗日宣传队、校护队，学校程志坚老师和方群英同志，在南朗圩头点着汽油挂在树上，手拿着摇铃集会，宣传抗日道理，我是基本听众之一。程志坚正义的、激昂的演说，启发教育了我们去卖花筹款，支援抗日。不久，日机轰炸安定小学，幸得老师及早带我们去山上树林躲避，才幸免于难。从此，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，就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复仇的种子。

中山成立了抗日义勇大队后，日军和伪军恨之入骨，在南朗一带设关卡，检查过路人，同时“扫荡”山区的游击队，实行“三光政策”。在白色恐怖下，抗日游击队更需要地下情报。程志坚老师托人叫我去田边村小学见面，教我把字条包在手帕的一角，遇到敌人搜身时，把字条咬下吞到肚里去，我顺利地送到涌口村黄英同志处。以后程老师通知我到左步村欧初同志已婚的妹妹家，给我填了一份表，从此，我成了平原交通员。她叫我把信送到李屋边村，参加来自附近村庄小学老师（游击队派出）10多人的集会。当时，天色已晚，我没衣服换，张卿同志借件衣裳给我，穿起来拖地，崖口来的女同志说：“小鬼！给你一条草绳，束在腰上就行啦！”会上发言很热烈，轮到我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我按程老师常说的两句话：“救国至上！抗日至上！”大家给我掌声，表示鼓励。以后，每当我接受了交通任务，赤着双脚、戴上草帽，独自走在陌生的田野间、村道上，心里都会涌上一股勇气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不做亡国奴，我是抗日一分子，死了也甘心”。

1944年4月4日，有位女游击队员带我入山区探望哥哥，走到流星队时已天黑，住了一晚，第二天爬山涉水，到大部队所在地，见到树林中操练的哥哥时，他叫我快回家。当时我看到清溪水畔，女同志边洗衣边唱歌，有的双手捧着山花，我如入画境，激动地说：“哥哥！我也参加游击队，我不回家了”。当他把我带来的挎包、鸡蛋、年糕收下后，转了转回来说：“大队长说你年纪小，留在平原掩护同志也是革命呀！”回家不久，部队派一位女同志

叫郑英，住在我家，我对父母说：“她是我的同学，因家穷停学，年纪大，南路来的插班生”。（编者注：欧素英在《难忘的回忆》一文中则称，郑英是她的老师。）

## 二、组织读书会，传播革命思想

云衢中学的所在地——南朗，是岐关东路的咽喉，五桂山区的出入口，每逢二、五、八圩期，是石岐小贩和当地农民买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，也是日军伪兵的重点驻守地。

作为当地最高学府的云衢中学，是教育学生、宣传抗日的重点。游击队派来的周宇老师，年轻机灵，态度和蔼，学生和校工都暗地里保护他的安全。周老师上课时，黑板上写满化学方程式，以此掩护他上政治课。当守在门口的校工吹响口哨，我们知道日本宪兵或特务来了，马上收起笔记，把化学课本摆上台面。站在窗口的敌人，探进头来看见是在上“化学课”，再到各班巡视一番，毫无收获，只得耷拉着脑袋离开。校工又吹响了长口哨，我们知道敌人走了，周老师继续讲什么叫享乐人生观、宿命论人生观、革命人生观。此后，班里组织了读书会，我借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写的《大众哲学》，后来又看了《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《论持久战》等。为了收藏方便，这些进步书籍都分装成小册子，交给校工放在厨房作废了的烟管里，敌人不易搜获。那时候班里有6位男女同学与周老师一起在校食宿，师生间、同学间互通情报，互相掩护。我们从事的革命活动，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。

## 三、练习歌曲，参加祝捷大会

抗日游击队经常打胜仗，从日伪、汉奸、土豪劣绅手上缴获很多胜利品，有轻重机枪、子弹和衣物等，此时就举行大会。有次在周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秘密地摸黑步行到合水口里去参加慰问演出。会场上坐满了持枪的游击战士和群众，四周点着煤油大汽灯，主席台上挂起“祝捷大会”的横幅，歌声此起彼伏。过一会儿首长来了，我看见了大队长欧初、滨海区区长吴子仁，还有我的启蒙老师程志坚。在学生的心目中，欧初是大家敬仰的抗日英雄，平时不容易见到的，现在见到了心情特别激动。首长讲话和鼓励立功的同志后，演出开始，都是短小精干的节目。我们因日间上课，晚上有时候到附近村庄宣传，没有时间排剧，只是上台唱了平日练熟的《喀秋莎》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《兄妹开荒》等几首歌曲。祝捷大会尽情欢乐的场面，把我们从白区带来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。回去时，部队派人护送，将到西村口时，我们散开，两三人一组，赤着脚，踮起脚尖走路，避免引起狗吠，引起敌人注意。当大家小心翼翼安全返抵学校时，走廊里吹来一阵阵夜来香，把我们那种紧张、恐惧的情绪吹得烟消云散了。我不敢半夜回家，睡在女同学温惠霜的宿舍里。至今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每当我闻到夜来香味，都会想起那些既兴奋、自豪又紧张、恐怖的夜晚。

## 四、秘密联络点定在我家

中山抗日游击队，经常袭击日伪汉奸，受到人民拥护，队伍不断扩大，在经济上需要各方面支持。我父亲欧仁普原是爱国华侨，当年为了推翻满清政府，在加拿大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同盟会，发动华侨捐款支持革命。他从加拿大回来之后，继承父业经商，被选为南朗商会负责人之一。经过大家商议，由每间店铺按月捐款支持抗日，他们主张把这些捐款集中放置父亲经营的浩隆五金店，由游击队派人按时来取。父亲说，欧初是我叔侄，儿子欧章又参加了游击队，我家目标太大，怕坏人告密不好办，商会同仁表示设法保护我家安全。父亲为了抗日，不顾全家六口人的生命危险，决然答应下来。从此，部队每月派大班胜（泮沙村人）手撮藤篮，扮成顾客，和我父亲聊几句，喝杯茶后，走进店尾房间，父亲从楼下来给他点数。此时我和母亲，分别到店前店后探看，没有可疑的人叫他从铺尾走，经新田地、西村返回部队。可能由于我父亲人缘好，在那恶劣的环境下未出过事。

可是有一次，把他吓坏了。起因是日、伪通过收税的密探，蓄意盘查从五桂山区出来销

售农副产品的客家人，从中找出为部队采购伙食的人员。于是，部队派李郁军等几位同志趁圩期出来，惩办密探。郁军是我舅母的侄儿，和我哥哥一起参加游击队，他到我铺饮了几杯茶后，看准日军巡逻队换班时间，突然从铺尾箭步跑去新田地转至圩尾，正好看到那密探在客家人摊前收税，他上前一手抓住其衫领，拖到闸门外，拿出匕首说：“你对人民犯下了罪行，中山抗日游击队派我来执行你的死刑”。话音刚落，那密探即血流满地地倒下去了。此时，鸡飞狗走，日军闻讯冲来，子弹乱飞，李郁军在同志们的掩护下，安全归队。父亲看到郁军在我店刚走，就发生此事，怕坏人告密，全家抄斩，惶惶不安。我安慰他说：“清除败类，大快人心，没事的，放心吧！”其实我心里也很担心。

## 五、敌人疯狂反扑，我差点被捕

抗战期间，侨汇不通，几家五金店生意不景气，父亲与友人合股改为和丰杂货店，我家搬往新田地另租屋住。此时伪区长何文中，已掌握南朗几间赚了钱的商店，企图绑架商人，然后勒索巨款逐个赎回，发一笔国难财。怎料遇上日军的杀人王，于1944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凌晨，几百名日军包围南朗圩，把从梦中惊醒的商人及店员押往西极山，黄昏时刺死刺伤30多人，我铺的3位伙计，被刺死1名，重伤获救2名，店铺清货倒闭，赔偿抚恤金和医药费。我家又搬回铺里住，父亲又遭第二次破产。

不久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，节节胜利，中国大地曙光已露。此时，当地日军欲向我云衢中学下毒手。为避免损失，学校关门，学生停课在家。我哥欧章因随部队攻打石岐伪四十三师，脚部负伤，在家休养。

为了消灭反动派，珠江纵队派出武工队去麻子村攻打反动头子梁雄据点炮楼，整座炮楼炸毁了，梁雄外出未被炸死。第二天，梁雄出动大班人马，由榄边一直搜索到南朗，声言要活捉欧初的人。爸爸和弟弟跑去西村朋友家躲避，哥哥欧章因为脚伤走不动，只好扶着他到铺尾水田中的草棚隐藏，我和妈妈则守在店中。不久伪中队副陈惠芳带着30多人，用重机轻机架在店门口，气势汹汹，扬言非抓欧章不可，他们一伙搜遍楼上楼下，大瓦缸、水井都找不到我哥哥。陈惠芳恼羞成怒，抓住我的右手，说我是南朗圩妇女会长，“云中”学生会主席。妈妈急着说：“她是学生，从未离开过学校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怎能当会长主席呢？你们误会了！”但陈惠芳一定要我去大部队问话，30多个伪兵围着我走。妈妈追着说：“你们带她上石岐，我也跟去石岐。”结果走到大部队门口时，有人站在晒台上发问：“抓到什么人？”陈惠芳答：“欧初的人，老八。”紧跟在后面的妈妈抬头一望，原来是伪中队长欧康（我家左步村的邻居，奶名帝有）。妈妈质问道：“帝有叔，你们为何要抓亚云（我的奶名）。”欧康马上跑下楼来，看到我们母女，即说：“误会了！误会了！”陈惠芳坚持说：“她是欧初的人。”我妈高声反驳：“她是学生，全南朗圩的人都敢担保她。”欧康解围说：“伯母，没事了，回家吧！”过后我问妈妈，欧康为何对我家这样“优待”？妈妈说：“他父亲吸鸦片，5个儿女，他母亲朝来我家借钱，晚来我家要米，要是不放你，我会当众叫他想想，他父亲死时谁给钱买棺材的？”

## 六、坚持斗争，迎接解放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，地下党组织继续领导我们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。

1949年，我正在石岐读高中，地下党组织本来安排我去五桂山游击区接受训练，迎接解放的，由于从南朗搬到茶东村的四区中学（前身为云衢中学）出了事而改变了。因该校体育教师刘传敏，私自带领一群学生去他家乡春阳，暴露了学校地下团组织，家长哭哭啼啼，要儿要女，反动乡长陈惠芳用机枪对着学校，吓唬师生，地下团组织涣散。此时负责四区地下工作的谢秉才同志对我说：“四区中学没有一个共产党员，进步老师陈建中只是民盟成员，

你是云中毕业的学生，熟识当地情况，组织决定派你回去负责四区团组织工作，又兼‘徐州’（即翠亨纪念中学的代号）的联络员，公开身份是榄边小学老师。”我服从革命工作需要，藉着执教3个月的时间，恢复了四区中学地下团员的活动，联系了团员陈佩诗、黎明亮、阮志远、李素霞、陈润梅、程连沛、程少奕等。因陈佩诗的妹妹是我的学生，我便以老师身份去家访，晚上住在楼上，按上级发下来的内容，通宵达旦写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标语，黎明前用绳把标语和浆糊从窗口吊下去，给黎明亮、阮志远、程连沛、程少奕等男团员骑单车去张贴，上至土草朗，下至崖口一带。第二天，四邻八乡赶集的人们看到标语后纷纷说：“昨晚游击队回来了！”“解放军进城了”。

此时，国民党节节败退，纷纷往澳门方向撤走，沿途各站都有一堆堆疲惫不堪的溃军。一天黄昏，我接到情报要马上送往“徐州”，团员程少奕即用单车载我前往，刚到翠亨车站，停在那里的溃军看到我们就开枪，我们只好扭转车头走，子弹在头上乱飞，我叫少奕走曲线避开子弹，安全回到南朗。我对着喘气的少奕说：“我们也算是经过枪林弹雨的一夜了！”第二天一早，纪中地下党派来南朗采购伙食的校工找到我，对上暗号，我把情报给他带回去。其时纪中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是曾海波，解放后在石岐一起开会，他站在我后面，轻声叫着我的代号“小央”，我回头一看，他笑着说：“每次送往纪中的情报，我都收到了，谢谢你！”

（选自《中山党史》1998年第2期）

中山党史